文史纵横

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彭玉平

越秀公园镇海楼(资料图) 陈秋明摄

中国文化的地域特性很早就引起了古之学者的注意。《汉书·地理志》与应邵的《风俗通义》等，就把一地之山川形胜与一地文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刘勰《文心雕龙》追溯屈原何以能“洞监《风》《骚》之情”，也认为得之于“江山之助”。可见地域文化是古代学者一直关注的主题，岭南文化当然也可以放在这种中国文化源流中来考察。

在中国文化的多个板块中，岭南文化是区别于中原、江南等地方文化的独特存在。岭南文化在历史上是深受岭南地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化类型，其最初的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岭南一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明代以前，岭南文化虽然也自足自洽，但毋庸讳言，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中却相对边缘。唐代名臣杜佑依据《禹贡》对九州的论述，认为岭南的物产贡赋、名山大川均不见《禹贡》记载，从而把岭南排除在九州之外。此说虽然并不流行，但至少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罕见的说法，在少数人看来，“九州”之外的岭南在文化上的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了。

张九龄画像 图/视觉中国

岭南的“岭”指南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五座山脉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现在主要指广东、广西、海南以及香港、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岭南的核心区域。这意味着，广义的岭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辐射的地域也相对收缩，广东逐渐成为岭南文化的主要地域。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在他们的观念中，往往以江南代替南方，而岭南不与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鲁迅《北人与南人》，他们笔下的“南方”都不涉岭南。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南北方的分际在哪里呢？刘师培说：“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神州的语言尚且“随境而区”，何况文化呢？刘师培观念中的南方文化是从淮河与汉水之间开始的。

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以长江流域特别是楚地的屈原为南方文学之代表。鲁迅的《北人与南人》，大致相当于京派与海派，江南也主要只取上海一地。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国维、刘师培与鲁迅等人的笔下，所谓南方大体到江南而止。被冷落的岭南，在强势的北方文化中，几乎找不到踪迹。

梁启超塑像 新会宣供图

康有为画像 资料图片

在季节感、风物感以及情感生成的方式上，北方文化与岭南文化堪称判然有异。如“悲秋”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堪称悲秋的代表。何以悲秋呢？在北方到秋季，万物开始凋零，天地肃穆，自然会引发生命的焦虑和惊恐之感。而在岭南，秋季是四季中最为舒适的季节，秋花如春花一般依旧灿烂、热烈，岭南人基本上不可能去悲秋，只是当秋叶在春天翻飞的时候，才宛然有一点北方之秋的感觉。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句，虽然依然是写的北方之秋，但移诸岭南，才是最有普适性的。所以中国文学中悲秋叹秋的主题，便是典型的北方强势文化与岭南弱势文化的区别所在。相对于北方，岭南人对季节的交替感相对要淡漠甚至迟钝得多。岭南与江南，虽然都在南方，但在古代文化的集体认同中，岭南僻居南方之南，自成一家，与江南、北方的交流因为地理的原因而困难重重，而江南与中原几乎一体，岭南与中原实际上处于长期隔膜的状态。

隔膜影响发展与融合，但也保持传统和特色。据考古发现，数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郁南磨刀山遗址就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岭南文明的历史因此与中原等地一样十分古老，把岭南看作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岭南原生文化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交融显得十分困难、十分缓慢，但也因此保存了比较原生形态的岭南文化。如《山海经》即有“番禺始作舟”之说，则岭南船舶制造业就是早期岭南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南岭不仅是岭南与岭北在地理上的分界线，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分界线。北方冷空气因为南岭而被强势阻止，南风暖湿气流也因此无法北上。客观上形成了岭南气候温润，生态多样的自然地貌与风物特征，与北方形成了比较大的差异。历史上的南岭，客观上阻碍了南北交通，但魏晋南北朝时，因北方战乱，许多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人为求生存，迁居岭南，形成了岭南的客家文化，以及带有原生意味的广府文化与潮汕文化。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岭南的多民族共存，多文化共生，也堪称民族融合的典范。

虽然古代岭南偏于一隅，在地理上遥隔强势和主流的中原文化。但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的大势终究不可抵挡。如果梳理岭南文化的发展，岭南对中原文化大体经历了受容、兼容、包容的阶段，并最终自成一家。从汉代开始，随着中原士人的陆续南下，北方文化开始浸润并影响到岭南文化的发展，如谢灵运与江总就是其中代表，只是交流之始，影响不大而已。真正影响到岭南文化应该主要是在唐宋时期，这一时期，一批优秀文人如韩愈、刘禹锡、苏轼、杨万里等被贬岭南，不仅形成了岭南独特的贬谪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岭南文化，唐代张九龄与宋代余靖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声望，张九龄有相位之尊，而余靖则将传统颂体与契丹语词汇合一，别成一种新的诗歌景象。岭南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受容渐成规模，同时结合本土文学，呈现出一定的兼容特色。换言之，唐宋时期的岭南文化，虽然大致呈现出北方文化与岭南文化双水并流的态势，但其实岭南文化的内质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明清两代在受容和兼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包容的文化品格。屈大均《广东新语》认为广东文学“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明代的岭南文化开始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开始引起了北方文化的关注，并在清代持续发挥影响。明清岭南特别是今广东地区文人结社十分活跃，从明初南园五子到此后的南园后五子、南园十二子，清代从岭南三大家、惠门四子、岭南四家等，这些社团活动频繁，作品成就明显提升，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并且由结社而逐渐发展为地域性的文化、文学流派，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南园五子之首孙蕡、南园后五子的欧大任、岭南前三家的黎遂球、岭南三大家之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以及明代丘濬、陈献章、湛若水、黄佐，清代廖燕、宋湘、张维屏、梁廷枏等，都是有全国影响的文人。可以说，明清两代的岭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峰峦独具，影响广泛。

岭南文化真正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从近代开始。在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加上近代海外文化从岭南的强势进入，使得岭南文化迅速完成蜕变并傲然崛起，开始以比较强势的面目而反哺北方文化，完成了新一轮的南北文化融合。其中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领风气之先，以过人的才胆识力推进了近代革命文化的发展。在岭南文化的内质上，不断锻造提升出强大的包容性、突出的思想性、强烈的忠义性、自觉的创造性和独创的雄直性等新的品质，有力地丰富并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格局和境界。

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海岸线漫长，海洋文化的特质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沿海岸线，岭南形成了独特的疍民群体，而在文化信仰上，也形成了不少与水相关的妈祖、龙母等信仰，这也是岭南原生文化的重要类型。当然，海洋文化的影响要更广泛，岭南文化中的冒险精神，勇于开拓，都可以看作是海洋文化的影响所致。岭南重视商业发展，广州十三行不仅是广州一地商业文化的代表，也是全国商业文化的一个典范，粤商与徽商、晋商共同构成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商帮”。明清时期，粤商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粤商会馆，其商业观念和运作模式也影响到全国很多地区。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品格由此而最终成型，这是独属于岭南的“江山之助”。

新时代新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一个定位于世界级的湾区从此确立，岭南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在世界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现在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湾区，两个在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一个在日本：东京湾区，一个就在岭南：粤港澳大湾区。这四大湾区入选2023年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的大学是135所，粤港澳大湾区以25所位居第三；在竞争力得分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以55.06分次于纽约湾区的100分，排名第二。这些数据看上去好像还可以，但换一个角度，全球前十二的高校无一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这意味着我们湾区的高等教育在提升质量和影响方面，还是其途漫漫。但有危机感，才思改革与进取；有目标，才有明天和辉煌。

岭南文化，一种值得期待的正在健步走向世界级的文化。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

诗文流变

看岭南与中原诗坛的交流 从岭南三子的岭外交游

□ 张琼

乾嘉时期，岭南诗坛人才辈出，岭南三子就是其中的风云人物。岭南三子，指冯敏昌、张锦芳与胡亦常三人。冯敏昌（1747年—1806年），字伯求，号鱼山，钦州人（今广西合浦），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分校官、刑部河南司主事等，主持过河阳书院、端溪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小罗浮草堂文集》等。张锦芳（1747年—1792年），字粲夫，一字药房，号花田，顺德人，著有《逃虚阁诗钞》《南雪轩文钞》等。胡亦常（1743年－1773年），字同谦，顺德人，著有《赐书楼诗草》。

岭南三子与中原士人交往密切，从他们的岭外交游活动中，可以看到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趋紧密。

一、岭南三子的得名：山东人李文藻之慧眼

“岭南三子”并称的出现，来自于山东人李文藻的慧眼识珠。李文藻（1730年一1778年），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官员，“为吏廉干，所至有声，宦十余年无一钱，携一拓碑老仆，搜岩穴，剔榛棘，载书数千卷自随”（《李南涧墓表》），对金石文物尤其有研究。李南涧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年底前往广东恩平任上，开始了宦游岭南的生涯，也由此建立起他与岭南学子的渊源。入岭后，李文藻又先后调任潮阳县知县、广西桂林府同知，参与主持了广东的科考，由此结识了胡亦常、张锦芳，李文藻便将胡张二人与先前已经结识的冯敏昌相提并论。在李文藻的《岭南三子诗示胡生亦常》诗中写道：“合浦珠去蚌亦死，川海精华有冯子。”“浮沉人海三年矣，二张词赋光峨峨。”“我得胡生如片玉，淹博兼作荒年穀。”其中，“冯子”指冯敏昌，“二张”则指张锦芳、张锦麟两兄弟，“胡生”则是胡亦常，“岭南三子”之说遂成定论。

二、岭南三子的岭外交游：加强与中原的联系

岭南三子都有北上求学的经历，但胡亦常年轻早逝，尚未建立起稳定的朋友圈；张锦芳、冯敏昌则不然，属于张锦芳、冯敏昌共同的师友有翁方纲、李文藻等人。

岭南三子与李文藻

应该指出，李文藻与三子的交情亲疏有别，李文藻与张锦芳最为投契。李文藻将张锦芳引荐给大儒纪昀、钱大昕，为张锦芳打开了京城的文化圈。在考古方面，李文藻更是张锦芳的引路人。张锦芳曾多次跟随李文藻考订古迹，“塔铭共考新出字，罗汉同摹旧唐绢”（张锦芳《五日寄怀李南涧冯鱼山都中》），作为本地人，张锦芳也陪同李文藻游览岭南的风景名胜，六榕寺、光孝寺都留下了他们共同的足迹。

在李文藻的《岭南集》中，有不少单独写给张锦芳的诗篇，如《芦林潭阻雨寄怀药房》《阳朔舟中寄药房》。李文藻于张锦芳而言，既是给他引路的老师，又是志同道合的知交好友。张锦芳受李文藻影响很深，集中唱和颇多，李文藻去世后，张锦芳深为悲痛，写下《挽李南涧先生六十韵》，极尽哀痛之意。

当然，李文藻与冯敏昌也有往来，但显然不及与张锦芳那么密切，主要原因是冯敏昌在京城求学，两人相处的时间短暂。但是，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尽管相处时间不长，冯敏昌也深深地被李文藻的学识风度所倾倒，他为李文藻写下大量的诗作，如《夜雨为李明府南涧题古木竹石》《南汉铁塔歌李明府南涧属赋》《南涧明府将发过别口占二律奉送》等，在《题李司马南涧<曝书图>》诗中，冯敏昌将李文藻与韩愈、惠士奇相提并论，“岭南文学兴，韩子功第一。百年数红豆，配飨歆橡栗。令子传家学，其书抱不出。公来令潮阳，弗遑梨枣恤。书成纪雠校，张生盖详密。”冯敏昌对李文藻刊刻经书、弘扬文教的功劳大加赞许。在李文藻逝后，冯敏昌先后写下《题南涧司马遗墨应兰圃属》《四月十九日保定道中梦李明府南涧作二首》，极尽哀痛之意。

至于胡亦常，因其英年早逝，李文藻与之交往无多，在其逝后，李文藻写有《哭胡生亦常二首》，对其早逝表示惋惜。

岭南三子与翁方纲

惠士奇之后，对岭南诗风影响最大的是翁方纲。翁方纲（1733年—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著有《复初集》等。

翁方纲在乾嘉诗坛的地位非常重要，其“肌理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三足鼎立。翁方纲与岭南的渊源来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这一年，他开始在广东连任两期学政，主抓教育，使岭南诗坛与中原诗坛建立了更为亲密、全面的往来。

岭南三子中，与翁方纲交情最深的当属冯敏昌。乾隆三十年（1765年），冯敏昌前往应试，翁方纲当即给了他“南海明珠”的赞誉，这对籍籍无名的冯敏昌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励。翁方纲鼓励冯敏昌，希望冯敏昌能上追南园五子，超越岭南三家，这让冯敏昌无比振奋。在翁方纲的耳提面命之下，冯敏昌形成了学问化的诗学追求，“学使翁覃溪太先生再复任至廉。先君遂晋谒受业，古今诗一变。”（《先君子太史公（讳敏昌）年谱》）。在翁方纲的引导下，冯敏昌还学会了鉴定文物。老师的教导让冯敏昌感激不已，他对翁方纲终生执弟子礼，别集中有大量写给翁方纲的诗篇，如在《奉和覃溪师舟发广州之作次韵》中，冯敏昌写道：“燕台果何在，程门幸蒙答。”对翁方纲的青睐，冯敏昌是受宠若惊的。

张锦芳与翁方纲的结交，同样开始于翁方纲在广东学政任上。在翁方纲的指导下，张锦芳对金石考据也小有研究，是岭南人公认的金石考据的行家。终其一生，张锦芳对翁方纲始终恭敬有加。张锦芳《赵子固落水定武阑亭从翁覃溪先生诗境轩获观赋此》作于1781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同集苏斋拜像听琴作画覃溪夫子命赋》作于1783年，记录他与翁方纲的金石之交、诗文之会，其中可见翁方纲对这位来自岭南的弟子的关爱。

岭南三子与其他名流

其他文人，诸如陆镇堂、钱载、黄仲则、余少云、洪亮吉等文化名人均与冯敏昌、张锦芳有不同程度的往来。钱载对岭南诗素有偏见，却对冯敏昌倾倒备至，“谓岭南自曲江后，诸子皆存偏方之音”，称其“力追正始”（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冯敏昌诗名能够远播中原，绝非巧合。

张锦芳与友人刘彬华书画合页（资料图片）

在岭南诸位文人中，张锦芳成名最早，与中原文坛的交往最为密切，得到的评价也很高，人称诗书画“三绝”，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将张锦芳喻为“步军协理头领二十六员”中第十位“双尾蝎”，在舒位所列108名诗人中，岭南诗人仅有张锦芳与黎简入选，而张锦芳的排位更在黎简前面，这代表着中原人对岭南诗人的评价和认可。

胡亦常英年早逝，得到的关注有限，这是比较遗憾的。

三、走出岭南：核心人物冯敏昌得到岭外认同

自从康熙以来，广东与中原、内地的交通转为频繁，文风诗风的交汇也愈来愈频繁。岭南士子受中原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入岭为官的官员。学政是朝廷钦差命官，负责对地方的教化。在学政有意识引导下，岭南诗歌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影响；另一个是岭南士子因做官、求学等原因进京暂住。京城是人才汇聚之地，岭南士子得以与学界名流往来，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在乾隆时期入岭的官员中，对岭南诗风影响最大者当首推翁方纲，拜入他名下的弟子数不胜数，而翁方纲也不遗余力地扶植后人，即就“岭南三子”而言，虽然“岭南三子”的并称不是由翁方纲提出，却是在翁方纲的栽培之下，“岭南三子”的地位得以建立。

不过，岭南三子的际遇各不相同，影响亦各异。胡亦常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建构起他的诗坛地位；张锦芳恬淡超然，安居家中，尽管与诗坛名流往来不少，但张锦芳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岭南；代表岭南在中原诗坛地位的，当属冯敏昌。正是在翁方纲的栽培下，岭南三子的核心人物冯敏昌得以走出岭南，建立起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冯敏昌不仅是道德楷模，也是学问大家，辞官后回岭南主持书院，以自己的威望获得众人景仰，从而将翁方纲的学说发扬光大，实现了学术的代际传承。冯敏昌先后主讲河南孟县河阳书院、花封书院，广东省肇庆府瑞溪书院，广州粤秀书院、越华书院，时间总共长达八年。他担任书院山长后，便致力于革除弊端，培养人才。冯敏昌培养学生，注重德才兼备，制定《学规》十六条，提倡优良学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提升了岭南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为岭南教育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冯敏昌培养的众多人才中，包括晚清粤东三子。晚清粤东三子，指张维屏、谭敬昭、黄培芳三人，他们都是冯敏昌的高足，都得到了冯敏昌的悉心栽培。张维屏《偶检故箧见冯鱼山先生敏昌手书见赠有声华日下荀鸣鹤志节琅琊邴曼容之句期许甚殷赋诗志感》一诗，是冯敏昌去世之后，他看到了先师冯敏昌写给自己的书信有感而作，冯敏昌对其爱之深、期之切，张维屏深有体会。在冯敏昌身上，体现了文化的传承。

更值得一提的是，冯敏昌与中原文坛耆老往来，是以平等的姿态交流，并没有低人一等的卑微之感。由于清初岭南的动荡，在清初岭南三大家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岭南文坛又复归于沉寂，直至惠门四子、惠门八子的出现，岭南文学开始复苏。不过，客观评说，惠门四子成就有限，还不足以抗衡中原。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冯敏昌身上。冯敏昌使中原人对岭南的印象得到了直接的改变。冯敏昌的交游，不仅面广，且层次高，他与那些社会名流交往，绝不是俯首帖耳式的亦步亦趋，而是泰然自若地平等对话，并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浙西六家”的钱载对冯敏昌殷殷嘱咐：“固当拔戟于三家之上，并驱中原，扶轮大雅，幸不以博取功名而自小之。”（《先君子太史公（讳敏昌）年谱》），已经把冯敏昌放在全国诗坛的范畴之中来衡量了。

冯敏昌的出色表现，使他得以与中原文坛耆老平等交流与对话，改变了中原主流文化对岭南文化落后的印象，使岭南的整体形象得到了提升，为岭南一隅挣得宝贵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意义上说，冯敏昌是岭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者是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